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难迈的步伐

20世纪上半叶西藏社会变革史论

罗 布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难迈的步伐

20世纪上半叶西藏社会变革史论

罗 布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难迈的步伐：20世纪上半叶西藏社会变革史论/罗布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ISBN 978 - 7 - 5097 - 8699 - 4

I . ①难… II . ①罗… III. ①社会变革－研究－西藏－20世纪 IV. ①D67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8096 号

·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

难迈的步伐

——20世纪上半叶西藏社会变革史论

著 者 / 罗 布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 目 统 筹 / 宋月华 周志静

责 任 编 辑 / 孙以年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 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 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1.75 字 数：353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699 - 4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编 委 会

名誉主任 江蓝生

主任 郝时远

副主任 晋保平

成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旦增伦珠 尕藏加 郝时远 何宗英

胡岩 江蓝生 晋保平 刘晖春

马加力 石硕 宋月华 苏发祥

许德存 (索南才让) 许广智 杨群

扎洛 张云 仲布·次仁多杰

周伟洲 朱玲

总序

郝时远

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是一个自然地理、人文社会极具特色的地区。雪域高原、藏传佛教彰显了这种特色的基本格调。西藏地区平均海拔 4000 米，是人类生活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藏传佛教集中体现了西藏地域文化的历史特点，宗教典籍中所包含的历史、语言、天文、数理、哲学、医学、建筑、绘画、工艺等知识体系之丰富，超过了任何其他宗教的知识积累，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十分广泛。因此，具有国际性的藏学研究离不开西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理所当然是藏学研究的故乡。

藏学研究的历史通常被追溯到 17 世纪西方传教士对西藏地区的记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从公元 7 世纪藏文的创制，并以藏文追溯世代口传的历史、翻译佛教典籍、记载社会生活的现实，就是藏学研究的开端。同一时代汉文典籍有关吐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及其与中原王朝互动关系的记录，就是中国藏学研究的本土基础。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中的藏学，如同汉学、东方学、蒙古学等国际性的学问一样，曾深受西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但是，西学对中国的研究也只能建立在中国历史资料和学术资源基础之上，因为这些历史资料、学术资源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史实，而且包括了古代记录者、撰著者所依据的资料、分析、解读和观念。因此，中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发展，



不仅需要参考、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成就，而且必须立足本土的传统，光大中国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门学问，藏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研究领域，“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即是立足藏学研究综合性特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自2009年“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组成了专家委员会，制定了《“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采取发布年度课题指南和委托的方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申报。几年来，根据年度发布的项目指南，通过专家初审、专家委员会评审的工作机制，逐年批准了一百多项课题，约占申报量的十分之一。这些项目的成果形式主要为学术专著、档案整理、文献翻译、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类型。

承担这些课题的主持人，既包括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也包括致力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后生晚辈，他们的学科背景十分多样，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语言学、生态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农学、地理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等诸多学科，分布于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类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专家委员会在坚持以选题、论证等质量入选原则的基础上，对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藏族聚居地区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些地区的科学研究院机构、高等院校大都具有藏学研究的实体、团队，是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具有时空跨度大、内容覆盖广的特点。在历史研究方面，以断代、区域、专题为主，其中包括一些历史档案的整理，突出了古代西藏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在宗教研究方面，以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影响、寺规戒律与寺庙管理、僧人行止和社会责任为重

点，突出了藏传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在现实研究方面，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突出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主题。

在平均海拔 4000 米的雪域高原，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之一，也是没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的中国实践，其开创性自不待言。同时，以西藏自治区现代化为主题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面对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特点、社会结构等特殊性，而且面对境外达赖集团和西方一些所谓“援藏”势力制造的“西藏问题”。因此，这一项目的实施也必然包括针对这方面的研究选题。

所谓“西藏问题”是近代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图谋将西藏地区纳入其殖民统治而制造的一个历史伪案，流毒甚广。虽然在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官方承认以往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是“时代错误”，但是西方国家纵容十四世达赖喇嘛四处游说这种“时代错误”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变。作为“时代错误”的核心内容，即英国殖民势力图谋独占西藏地区，伪造了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香格里拉”神话，使旧西藏的“人间天堂”印象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且作为历史参照物来指责 1959 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诋毁新西藏日新月异的现实发展。以致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上半叶，众多西方人（包括英国人）对旧西藏黑暗、愚昧、肮脏、落后、残酷的大量实地记录，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舆论中变成讳莫如深的话题，进而造成广泛的“集体失忆”现象。

这种外部环境，始终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集团势力炒作“西藏问题”和分裂中国的动力。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随着苏联国家裂变的进程，达赖集团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展开了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分裂活动。达赖喇嘛以其政教合一的身份，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非暴力”的“和平使者”，另一方面则挑起中国西藏等地区的社会骚乱、街头暴力等分裂活动。2008



年，达赖集团针对中国举办奥运会而组织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在境外形成了抢夺奥运火炬、冲击中国大使馆的恶劣暴行，在境内制造了打、砸、烧、杀的严重罪行，其目的就是要使所谓“西藏问题”弄假成真。而一些西方国家对此视而不见，则大都出于“乐观其成”的“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意图。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西藏自治区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正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西方世界不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达赖喇嘛不能接受西藏地区彻底铲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残存的历史影响。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中，有关中国的议题不少，其中所谓“西藏问题”是重点之一。一些西方首脑和政要时不时以会见达赖喇嘛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显示其捍卫“人权”的高尚道义。其实，当“西藏问题”成为这些国家政党竞争、舆论炒作的工具性议题后，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来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作茧自缚的梦魇。实践证明，只要在事实上固守“时代错误”，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只能导致搬石砸脚的后果。对中国而言，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一哲学原理没有改变，推进“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是由中国确定的，中国具备抵御任何外部势力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关注了国际事务中的涉藏斗争问题，而且尤其重视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议题。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进程中，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落实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的发展要求，是课题立项的重要指向。“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过程。如何把西藏地区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安



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不仅需要脚踏实地地践行发展，而且需要科学的研究的智力支持。在这方面，本项目设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课题，诸如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评估，西藏民生改善的目标与政策，西藏基本公共服务及其管理能力，西藏特色经济发展与发展潜力，西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国内外贸易，西藏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及其跨越式发展等研究方向，分解出诸多的专题性研究课题。

注重和鼓励调查研究，是实施“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基本原则。对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涉及甚广，特别是涉及农村、牧区、城镇社区的研究，都需要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课题指南强调实证、课题设计要求具体，也成为这类课题立项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我们设计了回访性的调查研究项目，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藏区调查基础上，进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回访性调查，以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微观社区的变化。这些现实性的课题，广泛地关注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人口、妇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改善问题，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传统技艺、风俗习惯等文化传承问题，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农牧业、旅游业、城镇化等经济发展问题，自然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等生态保护问题，等等。我们期望这些陆续付梓的成果，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反映藏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体现科学的研究服务于实践需求的智力支持。

如前所述，藏学研究是中国学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学术事业方面的重要支点之一。“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涉及的学科众多，它虽然以西藏等藏族聚居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从学科视野方面进一步扩展



了藏学研究的空间，也扩大了从事藏学研究的学术力量。但是，这一项目的实施及其推出的学术成果，只是当代中国藏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加油站，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综合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加强了藏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要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无论是理论预期还是实际过程，都面对着诸多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点的现实问题，其中包括来自国际层面和境外达赖集团的干扰。继续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进入结项和出版阶段之际，我代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专家委员会，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项目领导小组几年来给予的关心、支持和指导致以崇高的敬意！对“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办公室在组织实施、协调联络、监督检查、鉴定验收等方面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承担“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出版事务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课题鉴定环节即介入了这项工作，为这套研究成果的出版付出了令人感佩的努力，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3年12月北京

目 录

绪论 西藏近代史研究的新视角 / 1

第一章 走进 20 世纪的西藏社会 / 24

 第一节 凝滞的内部结构 / 24

 第二节 清朝治藏政策 / 49

 第三节 英俄“交窥藏地” / 73

第二章 清末西藏新政 / 90

 第一节 背景与缘由 / 90

 第二节 川边藏区改革 / 117

 第三节 西藏新政 / 161

 第四节 新政成效及其分析 / 191

第三章 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 / 211

 第一节 危难中的觉醒 / 211

 第二节 变革的努力和尝试 / 226

 第三节 新政改革的成效与影响 / 247

第四章 思考与分析 / 268

 第一节 20 世纪上半叶西藏社会变革的总体特征 / 268

第二节 帝国主义干涉与清末西藏新政受阻 / 272
第三节 英国“帮助”显阴谋 达赖决然断新政 / 283
第四节 社会内部惰性因素的阻碍 / 296

参考文献 / 319

后记 / 330

绪论 西藏近代史研究的新视角

一

19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世界的狂风巨浪，疯狂争抢、分割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日甚一日的侵略和清朝封建统治的日薄西山，中国也在这一风潮中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与此同时，地处青藏高原、长期与世隔绝的雪域西藏，也开始成为西方列强争逐竞夺的目标，尤其是南北相向、对峙交锋于中亚的英、俄两大帝国，更是以游历、考察、通商等各种名义，争相伸其魔爪于西藏。但是，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和西藏僧俗的殊死抵抗，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企图极难得逞于西藏。直到1904年英国发动第二次武装侵略西藏的战争，在侵略者凭借现代武器装备的强大攻势、西藏宗教性社会有心无力的抵抗、清朝政府妥协退让政策以及驻藏大臣施行“釜底抽薪”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英军直逼拉萨，并强迫西藏地方缔结城下之盟，才最终改变了殖民主义者在西藏被拒逐于门外的局面。

1904年英国对西藏的第二次武装侵略以及随后强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拉萨条约》，将藏局之危以及由此牵动的川陕等中原情势之危昭然于世，也才彻底震醒了衰朽中的清王朝，举国声讨迫使清廷改变其治藏政策的萎靡不振之态，推行新政，以挽危局。从派张荫棠进藏“查办事件”、筹划新政开始，清朝政府力图采用一些带有一定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方式，整顿和改革藏政，“收回政权”，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各业，向西藏社会植入某些有别于传统旧制的新因素。与此同时，派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于既在自然地理上与西藏紧邻，又在宗教文化及其管理上与西藏



地方有着错综复杂关系，并作为西南地区屏蔽中原的战略前沿的川西藏区强力推行以改土归流为主旨的新政开发措施，强调“藏务即是边务”^①，在川藏连通中筹划西南防务，“筹边援藏”，以固西南边圉。

从清朝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政策的角度来说，这一切与此前那种“因俗而治”“修其教不易其宜，齐其政不易其俗”的传统政策明显不同，带有许多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之影响而来的新的变化因素。与此同时，随着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的签订并将《拉萨条约》作为附约收录，英国在西藏攫取了大量政治、经济特权，并使西藏在法律和事实上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西藏社会半殖民地化的性质也由此开启并渐趋强化。

无论从清朝中央政府推行新政所带来的些微近代色彩，还是从英国侵略势力的渗透和殖民特权的攫取而言，西藏社会终究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开启”了与以往不同的历史进程。

在清末西藏新政艰难起步之际，作为西藏地方政教首领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凄苦的逃亡中，一方面指望向清朝政府面陈藏事，以图挽救；另一方面也企图向沙皇俄国寻求援助以抵抗英国。由于清朝中枢一方面迟迟不允达赖喇嘛进京陛见；另一方面则利用达赖喇嘛不在藏，和英国因中英、英俄条约的签订而无由干涉藏务之机，加大在西藏和川边藏区推行新政和改土归流的力度，而最终被允许的北京之行则让十三世达赖喇嘛深感失望。这种状况不但进一步恶化了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的关系，加深和激化了矛盾，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关系的恶化和矛盾的激化，使清朝在西藏、川边的改革更加阻力重重，举步维艰的同时，也促成十三世达赖喇嘛等西藏上层僧俗政治上的觉醒，突破佛家“檀越”思想的依赖性而重新构想西藏政教事务，从而逐渐形成了改革发展以自立、开发民智以自强的变革图强意识。

辛亥鼎革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带着对西藏政教事务的新构想从印度回到西藏，并利用国内新旧政权交替之机，借助英国的“支持”着手推行新政改革措施，试图通过改革弊政、整顿宗教、兴办实业、发展文教卫生事业，以改变西藏贫穷落后、无以自立的状况。尽管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新政

^① 《清德宗实录》卷五八七，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乙丑条。



改革在推行十余年后以停止藏军的建设与发展的方式予以中断，但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改革的影响下，西藏社会毕竟出现了一些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也催发了一些更为激进的社会改革思想。于是，在内与外、新与旧、僧与俗等不同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中，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历史上又断断续续出现了多次规模不等、目标各异的变革努力，掀起或大或小浪花，产生或短暂或较持久的社会影响，使西藏历史在错综复杂的多种矛盾关系中蹒跚而行。

显然，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历史，并非只是香烟缭绕中的一片沉寂。

本书研究的目的，就是想对20世纪上半叶西藏社会在外力刺激下举办的两次变革图强的努力——清末西藏新政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改革的背景、动因、举措、成败得失及其原因进行一次较为全面、深入的阐述和分析，并以此为着眼点，从现代化，即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或转型的视角进行考察和审视，寻求对20世纪上半叶西藏社会历史的发展获得新的认识。

二

按照美国学者布莱克的说法，人类历史上曾经产生了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现代化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①作为这种革命性转变的形态，现代化当然是某种持续的、长期的乃至漫长的过程，内容上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要而言之则可概括为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工业化、社会的城市化、思想文化的世俗化与理性化等。现代化首先萌发并实现于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并且随着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殖民扩张而逐步传播、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方，并在总结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经验基础上形成了早期现代化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世界殖民体系瓦解，原来的帝国主义—殖民地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冲突和斗争，转变成经济和社会上“先进”与“落后”的矛

^① [美] 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1~4页。



盾与反差，这种差距并呈现出越拉越大的趋势。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注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来自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出发，对这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在战后面临的发展困境及其道路指向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试图为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可行性方案，从而形成了以新兴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影响深远的经典现代化理论。

经典现代化理论遵循迪尔凯姆、韦伯等提出的传统社会学发展理论“传统”和“现代”的划分，以“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两极对立的理论作为其分析社会发展等问题的基本框架，认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落后是由其制度和观念上的落后造成的，只有在制度和观念上全面向西方国家学习，实现“西化”，才能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按照这种理论，战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现状不过是西方国家曾经历过的第一个阶段，而西方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世界各国共同的道路。也就是说，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只有先后、快慢的区别，而没有道路的不同。但是，亚、非、拉各洲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既不同于西方的“传统社会”，彼此之间亦千差万别，根本无法简单划在“传统”名下。这种隐含着“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结论的理论显然将复杂多样的历史过于简单化、统一化，从而暴露出其内在局限。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现代化理论家布莱克根据其对日本、俄国和东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研究，提出了“比较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认为现代化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在功能上不断适应现代性要求的过程，而不是西方化，并在方法上反对“两分法”将“传统”和“现代”截然对立的做法。布莱克指出，在非现代社会内部，有很多事情确实是有差别的，而且很复杂，很难用传统一词加以概括。在布莱克看来，各个民族都是重视传统的，即使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有些老传统是重要的，而且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也会创造自己的、也许并不那么持久的传统。传统的形式对现代时期具有很大的影响，以前的传统的消失并不证明取代这种传统的现代化形式能够生存下去。在任何社会内，一切比较现代的特点都是由以前的特点变革而来的。特别是对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来说，这些变革更有可能是在旧的形式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发生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由旧到新的直接变化的结果。当旧与新并存的时候，这种旧同原来



的旧已经根本不同了。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所受的限制只能来自以下两个方面，即现代以前的形式和现代化形式的生命力。有些传统的因素，可能是完全可以适应现代化的。^① 总之，新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与现代性二者不仅共存，而且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并在具体研究中一方面不把传统看作发展的障碍，而是力图发掘传统在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不对研究对象进行类别划分，然后再高度抽象地对问题展开讨论，而是力图将研究立足于具体实例，通过回溯历史来展现特定国家所特有的发展模式，同时更加重视外部因素在塑造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过程中发挥的作用。^②

尽管新现代化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相对更加重视寻求非西方社会内部独特的发展模式，而且不把非西方国家传统价值观念等因素完全视为阻碍现代化变迁的消极对立物，而是力图发掘传统因素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甚至肯定有些非西方国家在传统社会时期就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分化或现代因素的成长，但是不可否认，相对于因现代化变迁而兴起的西方世界，所有非西方国家都一样地成为现代化的后来者。这些后发国家现代化变迁的动力，不是源于自身社会内部因素的成长，而是来自西方的冲击，即随着殖民侵略而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制度文明与价值观念的传播。正如布莱克所指出的，“现代化的思想和制度在欧洲是由法国的革命战争和拿破仑传播的，同样这种思想和制度也是靠西方的探险者、商人、传教士、移民和军队传播到美洲、亚洲和非洲去的”。^③ 因此，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变迁，或者是由殖民帝国强迫而行，或者是自己政府主动推行改革，变革图强以应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威胁。对这种后发“外源型”现代化而言，“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启动要素”^④，其现代化变迁也因此而不可避免地具有“精英主义”特征，并在启动与发展序列上形成自上而下、由外

^① [美] 西里尔·E. 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周师铭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23页。

^② 苏耀昌：《新现代化研究》，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283页。

^③ 《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第24页。

^④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学林出版社，2006，第2页。